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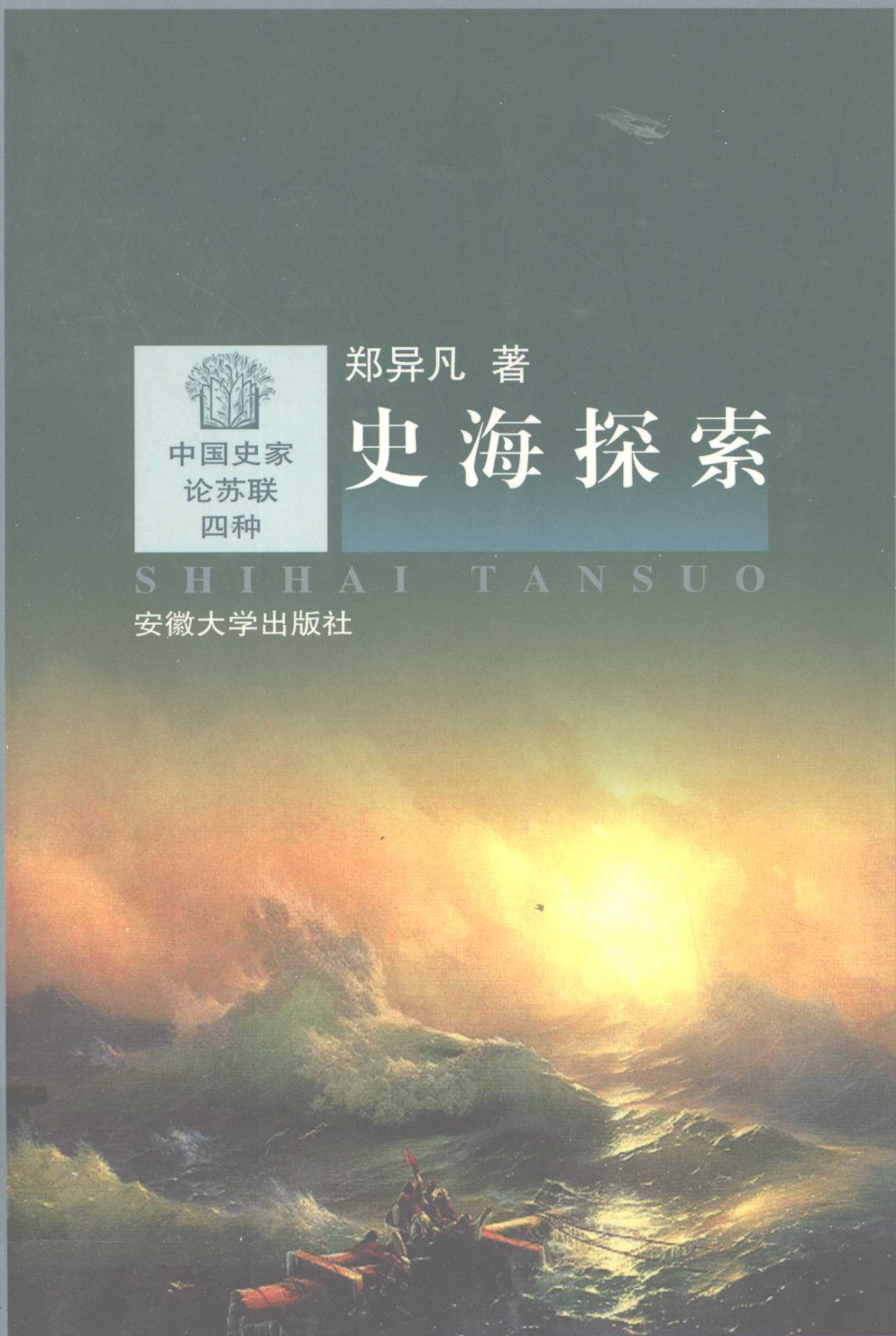
中国史家
论苏联
四种

郑异凡 著

史海探索

SHI HAI T A N S U O

安徽大学出版社



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

中国史家论苏联四种

史海探索

郑异凡 著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海探索/郑异凡著.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5.1

(中国史家论苏联四种)

ISBN 7-81052-757-6

I. 史... II. 郑... III. 苏联—现代史—研究
IV. K5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6690 号

中国史家论苏联四种 史海探索

郑异凡 著

出版发行	安徽大学出版社 (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 230039)	印刷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印刷厂
联系电话	编辑部 0551-5108458 发行部 0551-5108397	开本	880×1230 1/32
电子信箱	ahdxchps@mail.hf.ah.cn	印张	18.375
责任编辑	王先斌	字数	462千
封面设计	张 犇	版次	2005年1月第1版
		印次	2005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7-81052-757-6 / K·57

全套定价:148.00 元
本册定价:37.00 元

如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中国史家论苏联四种》序

长期以来,中国的苏联史研究是一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定天下,从论点 to 史料差不多都取自这本“经典”。我国对苏联历史进行独立的、科学的研究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事。坏事变好事,正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促使我国的史学工作者认真反思和研究斯大林模式的弊病和诸多问题。错误是我们自己犯的,但从源头考察却是同斯大林模式分不开的。这样,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我国一些学者开始了对苏联历史的艰难而富有开创性的研究。本丛书的作者郑异凡、徐天新、叶书宗和杨存堂(笔名柳植)四位教授就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学者。他们有大体相同的特点:受过正规的史学教育,有比较扎实的基本功,能较为熟练地使用俄语,勤于思考,勇于探索,有献身于这一学科、甘坐冷板凳的精神。正因为这样,在我国改革开放起步的时候,在三中全会的鼓舞下,他们对苏联历史上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重新审视,在报刊上、学术会议上,就苏联历史上的各种问题,诸如列宁晚期思想、斯大林模式、十月革命、军事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农民和农业集体化、工业化、现代化、对外政策、卫国战争、大清洗及布哈林、托洛茨基、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历史人物评价诸问题提出不少颇有价值的新见解。

这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步深入的过程。一个问题的研究是受多方面因素制约的。这里既有思想解放的问题,也有能接触到的史料问题,甚至还有当时社会环境对提出的论点所能接受的程度问题。这是一个相当艰苦的工作,特别是在起步阶段能看到的资

料是非常有限的,而某些人的头脑还在“作茧自缚”,这直接影响到成果的发表。1984年,我曾借《世界历史》发表郑异凡的一篇文章之机写了一篇短评,叫作《没有必要作茧自缚》,认为马克思主义必须随时代的推移和实践的积累而发展。历史科学也不例外,要勇于并且善于开拓新的研究领域,选择新的历史课题,对多年争论不休或者不敢问津的老问题提出新的答案。实践证明,在苏联史的研究上,人们的头脑一旦摆脱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束缚,就是根据不多的资料,也能得出新的较为符合实际的结论。也许在开始的时候某些论证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而显得单薄或者不够充分,也许某些论点会引起过学术界的争论,但是,随着资料的发掘,特别是苏联历史档案的大量解密,随着对问题研究的深入,在许多问题上史学界逐渐取得了共识。当然对一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是自然的,完全消除不同意见既没有必要,也不可能。

我很高兴,在我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80年代,有一批包括这四位学者在内的有志于苏联史研究的所内外学者就苏联史上的问题进行认真研究,共同切磋,不断提出新的见解,在我国形成一个颇具实力的研究群体。经过二十多年的不懈努力、刻苦钻研,他们各自在研究课题上取得了颇为丰硕的成果,出版了颇有影响的专著。现在呈献给读者的是他们二十多年来发表的文章选编,^① 这些文章有不少曾经对我国理论界、史学界的拨乱反正、对恢复苏联历史本来面貌发挥过重要作用,推动了我国苏联史的研究。苏联解体以后,他们又以历史学家的眼光,结合苏联和俄国的历史,总结一个大国解体、一个大党丧权的教训,评析苏联解体以后出现的事件和现象,苏联史的深厚功底使他们在这方面的文章也有其独到之处。

① 郑异凡已经出版了从“文化大革命”结束至苏联解体期间的文集《不惑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所以郑异凡的《史海探索》只收苏联解体以后的文章。

文化需要积累。为使他们的研究成果得以保存,为使后来的学者能看到他们的成果,保持史学研究的继承性,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本书的出版。这是一件值得赞许的举措。对历史的认识、对问题的探讨永无止境。这四位学者的文集所反映的是我国对苏联历史探讨研究的一个阶段的历程,许多问题还有待深入,相信随着新档案资料的发表,随着认识的加深,在俄国和苏联历史的研究领域还会有更多更好的史学作品问世。

朱庭光

2003 年 12 月

走过的路(代前言)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小学读水浒、读演义,初中读武侠、读侦探小说。全国解放,进了高中,热衷于解放区的小说,学校图书馆里的此类新书几乎都读遍了,甚至第一次文学艺术代表大会的文件集也借来啃。所以到中学毕业,我毫不犹豫地就报考了中文系。说毫不犹豫,是因为高中期间,清华大学地质系的一批大学生到我们江山实习,就住在我们的江山中学,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大学生。受这些大学生的影响,我们班级考地质系的同学特别多。我1952年考上了复旦大学中文系——在我们班上是唯一考文科的。

那时强调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在中文系读完一年级,组织号召报考留苏学习。我喜爱的是文学,所以内心对报考并不很积极,我知道如果去苏联学习,就得放弃我心爱的中国文学。不过,这是党的号召,所以也就报名了,并且还考上了。于是到了北京俄文专修学校二部(留苏预备部)。在那里学习一年俄文,1954年踏上去苏联的旅途。

到苏联被分配在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分配的专业是“马列主义基础”,由中央编译局保送。那时斯大林已经逝世,苏联内部在进行微调,取消了这个专业,虽然还设有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教材的“马列主义基础”这门公共政治课。这样就只好改学“苏联历史专业”。记得读高中的时候,江山中学举办历史征文比赛,题目是《中国农民战争的革命传统》,我花了几天时间写了一篇

文章应征,不料得了第一,学校奖给我一本潘克拉托娃主编的《苏联通史》第1卷。命运的安排,这就是我同苏联历史结下不解之缘的开端。

大学毕业论文题目是《1925年联共(布)反对“新反对派”的斗争》。选这个题目的原因是,那时国内正大张旗鼓地宣布进入社会主义,我想知道什么叫社会主义,于是就选了20世纪20年代苏联关于一国社会主义问题的争论作为研究的课题。问题自然没有能够搞清楚,但通过这个课题倒是看到了不少“反面”材料。反对派问题涉及当时苏联学术界的禁区,有关反对派的资料在当时的苏联都还是绝密的文件,被保管在专门的书库。幸好离我们历史系不远的科学院图书馆同意给我们办“东方图书阅览室”的阅览证,利用这个阅览证可以借阅专库的图书资料,我得以查阅反对派人物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人的著作,党的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以及《真理报》、《列宁格勒真理报》等珍贵资料。这些资料在大学图书馆、谢德林公共图书馆都是找不到的。在30年代的禁书焚书过程中毕竟还是留下了一批重要资料。那时候虽然出现了对苏联史的某些问题的重新评价,整个说来,苏联史的研究还深深地处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影响之下,论文自然写不出什么新意。记得导师卡尔纳托夫斯基教授的评语是:很高兴中国的共青团员在所研究的问题上同苏共的观点一致,论文表明作者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推荐读硕士研究生。值得一提的是答辩过程中的一个插曲。按照惯例,每次论文答辩都请一位老师担任评论员。担任我的评论员的是著有《苏联新经济政策年代阶级斗争简史》的特里夫福诺夫,他对我的论文提出一个问题,说文中有不少反对派言论的直接引文,而按照他们国家的惯例,是不能允许的,因为直接引用等于宣传他们的反革命言论。如果是过去,仅凭这一点就足以把论文枪毙的。时代毕竟不同了,我的导师出来为我说话,认为这是论证的需要,这种惯例未必合适。由此可以

想见,那时苏联的学术界尽管出版了大量批判反对派的著作,但是反对派到底主张些什么,读者是看不到、也不可能知道的。

1959年回国,在中央编译局工作,此后一生就没有挪过地方,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特色。那时候中苏已经开始交恶,很快就开始了一场所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争论,或曰中苏大论战,或曰“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对这场争论后来邓小平有很好的评价,就不多说了。我们单位很自然也卷入了这场斗争。那时在争论中,赫鲁晓夫暗示中国领导人持托洛茨基主义观点。中国共产党虽然反托派多年,但到60年代初,对到底什么是托洛茨基主义还是不清楚,于是就让我们收集和整理托派的材料。这项工作交给我和林基洲同志。根据我们的推荐,三联书店组织翻译出版了一批托洛茨基的著作,经过几年的工作,可以说,托洛茨基的主要著作已经有了中译本,这填补了我国研究苏共党史、国际共运史资料的一个空白。在这个基础上,我和林基洲一起编译了15个专题的托洛茨基言论。后来以《托洛茨基反动言论》为书名出版。

我们的工作当时叫作编译“反面教材”,这些工作都是上面布置下来。“文化大革命”爆发,有人贴大字报,说我们是为“阎王殿”(中宣部)提供“反党炮弹”,而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则是什么“托派”、“修正主义分子”。其实,对这些事我本来是可以不管的,因为在编译局我是一般干部,除了给我戴一顶“黑秀才”的帽子外,还整不到我头上。但因为多少知道这些工作不单是“阎王殿”那里来的,是属于更高级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下达的任务。于是我和殷叙彝同志一起对这些工作的来龙去脉进行了一番调查,找了一些了解内情的人物(大多被关在“牛棚”),查阅了一些被打成“三反”分子的交代资料,最后整理了一份材料,说明编译“反面教材”的任务是按毛泽东直接指示办的。考虑到过去中央编译局的许多工作是康生交下来的,他当时又是中央文革的顾问,就把这份材料上报到康生

那里,目的是请他点一下头,证明我们的工作确实是为“反修”斗争服务的,是从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下达的任务。报告上去后并无回音。此事也就放下了。不料后来搞了个“抓 516 运动”,军宣队和工宣队把我和几个同志当作审查对象。过来人都知道,那时候搞运动颇有特色,也不告诉你犯了什么罪,就是要你本人交代同“516”的关系。实际上,我除了在文革初期听说过有一个北京中学生组织的“516 兵团”外,对什么“516”一无所知。自忖也没搞极左。所以搞得我百思不得其解。关了五十多天,后来又到位于江西进贤的“中办五·七学校”当了两年的“非革命群众”。直到两年快结束了,军宣队才告诉我,审查的原因是我“整康老的黑材料”,“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康办把我的材料转回来了。后来大家当然都知道康生是什么人了。就是他给中国的托派戴上“公开参加国民党特务机关”、“与日本特务机关合作、领取日寇的津贴”的罪名,他知道粘上“托派”的危险性,就把有关他也参与布置的工作的材料打成“黑材料”。即使康生倒台,我也不认为我那时的行动是什么“反康老”行为。我只不过是履行一个公民、一个国家工作人员向上级反映情况的权利或义务而已。

60 年代初,赫鲁晓夫有为布哈林平反的打算。为此上头交给我们一个了解布哈林问题的任务。其成果除了内部报告外,就是编译了一本《布哈林言论》。不过三联书店打出清样之后不久,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出版的事就此搁浅。到“文化大革命”后期,重出版《布哈林言论》,清样已经找不到了,于是又组织了几个收集资料,编译成书。本来我并没有参加此书的编译工作。但到写前言的时候,前言迟迟写不出来,于是把差事交给了我。本来编译《布哈林言论》是为配合当时的大批判之用的(那时张春桥正在批“资产阶级权利”),前言自然也必须为此服务,用的是文革的语言,其内容可想而知,这是一篇根本错误的东西。只有一点值得一提,根据我当时所看到的资料,可以确定布哈林不是叛徒、内奸。前言

就有意避开了这顶不符合事实的帽子,这等于悄悄地给布哈林摘掉了反革命的帽子。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批判“四人帮”的运动。批判的内容之一是结帮篡党。《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主要根据《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编写的有关托洛茨基在列宁病中结帮篡党的文章,说“四人帮”就是当年的托洛茨基帮。由于“托派”这个名字长期以来等同于反革命,所以读起来非常痛快。大概受到这篇文章的启发,《人民日报》要我们单位写一篇更有分量的“大文章”,批判“四人帮”。那时我正请病假,领导找到家里来,要我来执笔。那时大家批“四人帮”的热情很高,我马上参加了这篇文章的写作。最后,由我执笔写成一篇《篡党夺权的托洛茨基帮》,以谷山的笔名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当时影响非常大,各报纷纷转载。批判“四人帮”篡党夺权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文中有关托洛茨基的种种提法却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后来经过研究,我对托洛茨基有了不同的评价。这是后话。

在“四人帮”时期的“大批判”中,有一个流毒甚广的东西,那就是对所谓“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在那是非颠倒的时代,所有抓生产、搞经济的行为都被斥为“唯生产力论”。所以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个重要的拨乱反正举措,自然是声讨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在《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的名目索引中确实有一条叫作“‘生产力’理论和对它的批判”(теория “производительных сил” и её критика)。中国译界好走极端,正如“物质主义”在我国被译作“唯物主义”一样,“生产力理论”就译作“唯生产力论”。《列宁全集》设这一条是同斯大林当时批判过第二国际领袖的“生产力理论”有关的。不过斯大林说得很不清楚,他到底要批判什么可能连他本人都不太明白。当时的批判文章都认为是“四人帮”歪曲了列宁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也就是承认列宁批判过唯生产力理论,但不是“四人帮”所说的那个意思。这样,就得承认存在一个“唯生

产力论”，而列宁到底批的是什么呢却谁也没有说清楚。我查了一下“唯生产力论”惟一的出处《论我国革命》及其有关背景，特别是找到列宁所批判的苏汉诺夫的《革命札记》。发现列宁根本就没有批判过什么“唯生产力论”，相反地，他肯定了社会主义需要以一定的生产力、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作为前提，因此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到一定的阶段就必须把工作重心转到文化经济建设上来，为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物质前提。这样我就写了一篇《评所谓列宁批判“唯生产力论”》，说明列宁从来没有批判过什么“唯生产力论”，因此也不存在歪曲列宁观点的问题。文章寄给《人民日报》理论部，很快就寄来清样，理论部副主任汪子嵩先生在来信中建议用真名发表——此前的文章（集体的和个人的）都用“谷山”的笔名。从此以后，我的文章绝大多数都用自己的真名发表，这是对自己的文字负责的一种表示。文章见报的当天，“新闻联播”播发了此文的主要内容。

同汪子嵩先生打交道，经常是他出题目，我奉命写作。汪先生有一个思路，写拨乱反正的文章首先要为领导人服务，帮助他们纠正过去流传的某些错误如理论和被歪曲的历史。我们的领导人要处理大量的具体事务，很少有可能去专门研究比如国际共运史上的各种问题。国家养育着我们这些人，应当在这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正因为如此，每当文章发表，汪先生总是及时反馈上头的反应，特别是胡耀邦同志的反应。汪先生曾多次要求写一篇关于列宁批判“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文章。我那时没有接触过有关资料，所以一直没有答应。过了些时候，汪先生又提出这个选题。我也觉得这个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于是动手找资料。令我吃惊的是，“四人帮”否定人类创造的文化遗产、否定一切文化的论调竟然同当时列宁批判过的“无产阶级文化派”有惊人的相似。我同宋鸿训同志合作写了一篇《列宁对“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批判》，接着又写了《文化继承问题上的一场论战》、《列宁怎样领导文艺工作》、

《苏联建国初期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问题的论争》等一组文章。作为研究的副产品,不久人民出版社给我出了一本《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论争资料》。本来应当把这个问题继续研究下去,但是由于当时拨乱反正工作的需要,迫使我放下这一课题,跳到另一些课题上去了。

一个大课题是关于布哈林问题。布哈林问题我在文革期间已经有所接触,起因是当时批判刘少奇同志,“四人帮”中有人说刘少奇比布哈林还布哈林。我找了一些资料看,觉得两人的某些观点确实有相似之处,就写了一篇“大批判”的大字报。这篇文章通过油印刊物被《光明日报》选中转载了。很遗憾,这篇文章在政治上完全是错误的,配合了打倒刘少奇的运动。因为那时候,布哈林的名字如同托洛茨基一样等于反革命。当然,打倒刘少奇同志的主要“根据”并不在这里。不过就刘少奇与布哈林的观点而言,我现在还觉得两人有可比之处。刘少奇对列宁《论合作制》一文的理解是最接近列宁本人的原意的,因此也是同布哈林的解释吻合的。他关于“发财”的言论同布哈林的说法也非常接近。如此等等。“以阶级斗争为纲”是整个文化革命的祸根之一,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要正本清源自然就需要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这就自然令人想起布哈林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是像布哈林所说的随着社会主义的胜利而逐步缓和以至消失,还是像斯大林所说的随着社会主义取得成就越多而越尖锐化?我国在20世纪50—70年代显然遵循了斯大林的理论。在斯大林的理论出来之前,布哈林曾经对无产阶级国家阶级斗争的发展趋势提出过自己的看法,他的观点被斯大林概括为“阶级斗争熄灭论”。为了了解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阶级斗争的发展趋势,我对布哈林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进行了探讨,写出了《重评布哈林的“阶级斗争熄灭论”》一文。这篇文章写成后,由于事关重大,就交给了领导审阅,此文在领导们手中转了将近一

年时间,一直没有下文。有一位领导说,看来就是文章所说的那种情况,但是发表要慎重。这就等于说不能发表。

1980年5月,四川成都召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讨论会,邀请我参加。当时我带了两篇论文与会,一篇是《苏联建国初期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问题的争论》,另一篇就是《重评布哈林的“阶级斗争熄灭论”》。主持会议的同志选了布哈林问题。这样我就在会上做了关于布哈林问题的发言,对这个多年被当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列宁主义死敌、叛徒、内奸的历史人物作了重新评价,对他在若干理论问题上的观点作了肯定。这个发言无异于在会场上投放了一颗重磅炸弹,一时议论纷纷,支持者有之,反对者更多。有人抱怨,说他是坏蛋的是你们(编译局的人),说他是好人的也是你们,到底信谁的?对不起,没办法,只能相信历史事实。我人还没有回到北京,发言内容已在京城传开。回到北京后,我应邀到北京市国际共运史学会作了一个报告,其内容就是发表在《世界历史》1981年第一期上的《有关布哈林的若干问题》。编辑部收到稿子后,很快就作为头版文章发表。对编辑部的同志来说,这确实需要足够的理论勇气和历史胆识。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作出新的评价,引起不同的意见是很正常的现象,如果大家都举手赞成,那倒是反常的了。《世界历史》杂志接着发表了多篇争论文章。争论文章的出现,是一个好现象。我那篇关于布哈林的文章是一篇提纲挈领的东西,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阐述。争论促使我把研究深入下去,例如关于所谓列宁批判布哈林的无政府主义问题,是斯大林开始做的文章,影响甚深,要正本清源,就必须彻底查清列宁和布哈林当时到底是怎么说的,布哈林本人的基本观点到底是什么。这样,我在查阅大量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写出了《列宁和布哈林在国家问题上的分歧及其消除》。在当时国内外文献中,可以说这是把问题说得最透彻的一篇文章。争论过程,也是我个人学习和深入研究的过程。

文化革命结束之后,有一些学者已经感觉到布哈林问题的重要性,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重新审视。我在成都开完会后,途经上海出差,在那里得知上海师范学院的叶书宗同志刚刚在上海社科联作了关于布哈林不是三仙巷暴乱的制造者的报告,从一个具体问题上给布哈林摘去“反革命”的帽子。回到北京后,得知意大利正准备召开一个关于布哈林问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有同志建议我设法参加。但那时我们单位还没有派人出国参加学术会议的先例,只好作罢。不过社科院马列所所长苏绍智出席了这次会议,回国后到各单位作会议情况的介绍,这对大家了解布哈林问题的真相起了很好的作用。年底,由马列所牵头举办了“布哈林研讨班”,全国有二十来人参加。我是学员之一,不过在班上作布哈林问题启蒙报告的是我和编译局的其他两位同志。我介绍了布哈林的生平经历和主要观点。研讨班对推动全国布哈林问题的研究起了良好的促进作用。由于参加者多数是高等院校的老师,他们回去后在讲课中改变了对布哈林以及联共党史中的某些问题的提法,推动了国际共运史的研究。可以说,这是重新研究斯大林模式的开端之一。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深深感觉到原先编译的《布哈林言论》已经完全不适应研究的需要了。我所在的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了一部三卷本的《布哈林文选》,其所收资料之多,迄今为止国内外还没有超过者。此前,我和社科院经济所余大章同志合译的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已经在三联书店出版,这是解放后我国第一次公开出版布哈林的著作。

布哈林问题研究的意义不仅仅是为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的冤假错案平反昭雪,还为研究斯大林模式找到了一个突破口,说明苏联历史上除了斯大林模式外还存在过另一种选择,即布哈林所捍卫的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模式。此外,布哈林的理论遗产中也有不少可以借鉴的东西值得我们注意。

布哈林问题的研究并不是一帆风顺的。1984年,《世界历史》编辑部组织出版《苏联现代史论文集》,约我写了一篇《论布哈林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不料稿子送到出版社后,出版社怎么也不收这篇文章。《世界历史》杂志只好在自己的刊物上发表这篇文章了。当时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世界历史》主编朱庭光先生专门为发表此文写了一篇短论《没有必要作茧自缚》。关于这篇文章,1998年值《世界历史》创刊20周年之际我曾在发言中提及,我说:这是一篇写得很好的文章,他借布哈林之题发挥,提出必须把学者的学术见解同代表党和国家的对外发言明确分开,在历史的学术研究中没有必要作茧自缚。马克思主义必须随时代的推移和实践的积累而发展,历史科学也不例外。要勇于并善于开拓新的研究领域,选择新的历史课题,对多年争论或者不敢问津的老问题提出新的答案。评论触及的问题是一个长期影响我国世界史,特别是苏联史研究中的一个几乎是积重难返的问题。这种思维定式仍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我们的学术研究和成果的发表。

90年代中期,一些苏联史研究者曾经同一家杂志社商定,每年出版一期苏联历史专辑。第一次编定的专辑中有我的一篇文章《知识分子问题和布哈林的“奇谈怪论”》,文中提到布哈林早期对知识分子定性错误,也提到《共产党宣言》中没有把阶层同阶级作严格的区分,列宁的《怎样组织竞赛》一文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骗子、流氓相提并论,等等。由于我的这篇文章以及另一作者的文章,“苏联历史专辑”就不明不白地夭折了。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在早期阶段或者在某些文章中出现某些不准确的表述,是完全正常的。《共产党宣言》的各种版本的序言就不断指出宣言本身某些提法已经过时。

在进行布哈林研究的时候,不断碰到其同时代人的问题。这使我感觉到孤立地研究布哈林一人的问题是难以深入下去的,必须把苏联史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才能

把握全局,避免偏差。所以在开展布哈林问题研究的同时,我把对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等等苏联历史早期的重要人物的研究同时提上日程。在80年代,我的一个研究项目是列宁的晚期思想。我同时作两件事。那时编译局正在编译《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人力不够,主管此项工作的林基洲同志要我帮忙,我想尝试把研究同翻译结合起来,就接受了《列宁全集》第43卷的校订任务。这是《列宁全集》正文的最后一卷,也是最能反映列宁最后思想或者晚期思想的一卷,这就可以同我已经开始的列宁晚期思想的研究结合起来。在80年代后半期,由编译局发起接连召开了两次列宁晚期思想研讨会(在福州、郑州)、“一国社会主义问题”研讨会(杭州)、《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研讨会(上海)、布哈林问题研讨会(天津)和斯大林问题研讨会(南宁)。这样的研讨会把苏联从十月革命到30年代的问题联系起来考察,视野开阔得多,能较有效地避免片面性。

关于列宁的研究,我是从探讨“列宁主义”一词的起源开始的。十月革命之前是没有“列宁主义”的用语的,有也用在否定的意义上。什么时候开始从正面意义上使用“列宁主义”的呢?流行的说法是托洛茨基在列宁去世后的悼文中第一次使用,也有说是季诺维也夫首先使用的。不过我相信说者并没有查过第一手资料。所以我就用了一贯使用的笨办法——一天天地查阅1923年前后的《真理报》和《布尔什维克》杂志。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发现《真理报》1923年3月刊登的加米涅夫的一篇文章第一次使用了“列宁主义”,这是在列宁本人已经不可能表示意见的情况下出现的术语。说实话,这可以推翻托洛茨基首先使用说,但还不足以确定最早使用者。因为这仅仅是《真理报》和《布尔什维克》杂志提供的资料,没有可能看作更多的资料。还发现在列宁逝世之后苏联曾出现大批阐述列宁主义的文章和著作,斯大林论述列宁主义的著作并不是惟一的著作,那时也没有被看作列宁主义的标准解释或者